

一种关注

书问道

这一只永不断线的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评今日收官的谍战剧《风筝》

张斌



▲《风筝》的影像语言依然具有柳云龙谍战剧的特点，缓慢、沉静、执着，特写镜头与略微仰拍的镜头偏多。▶罗海琼饰演潜伏在共产党多年的特务韩冰。

柳云龙归来，《风筝》热播，谍战剧再掀收视热潮。观众们绞尽脑汁猜测谁是影子，并惊叹于“郑耀先/鬼子六/周志乾”那复杂曲折、惊险壮阔又苦难多舛的人生。从《暗算》《血色迷雾》《告密者》到

《风筝》，被誉为“谍战剧教父”的柳云龙在荧屏勾画出了一条牵动中国电视剧观众的谍战曲线。而《风筝》，因其对信仰的动人刻画，对谍战剧的创新探索，势必成为这一曲线中值得讨论的高点。

信仰有光芒，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

《风筝》分明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葛之上，那不可混杂和抹杀的，依然是无比深沉的信仰。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

谍战剧的精神和价值基点，无一例外建立在忠诚和信仰的基础之上。《风筝》自然也不例外。但这一次，柳云龙对信仰的刻画，让人物走出了一条异常坎坷，却让理想光芒四射的道路。

谍战剧虽然人物关系看似复杂，但核心的冲突反而比较简单，通常体现在敌我双方的对立中。但《风筝》却设定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极端复杂和多元的冲突情景。身为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18年的高级谍报人员郑耀先(代号“风筝”)，却不得不披着心狠手辣的军统六哥的面皮，人称“鬼子六”——因为只有“比军统更军统”，才能在敌人的心脏立足。在在不断有同志死在鬼子六手上的“事实”面前，不知其身份的我党地下力量反复通缉追杀鬼子六。这样让观众颇为惊奇的反常故事情节，将郑耀先置于三方力量间，并进一步落实在“风筝”和“影子”对垒中。这一次，忠诚和信仰的考验，已经不主要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或者说来自历史命运的考验。郑耀先最大的恐惧，不在于生死，而在

于死后被永远扣上屠杀同志的“鬼子六”的帽子。《风筝》要回答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因而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探求色彩。

郑耀先在接受潜伏任务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背负上了永生不被组织认可的可能的。这就是说，无论做出了多大贡献与牺牲，自己都有可能化为尘埃永埋黄土，且被同志永远误解。这种献祭充满了难以救赎的悲壮。在剧中，柳云龙也通过影像对此进行呈现。他的单线联系人陆汉卿被中统抓捕入狱，接受严刑拷问之时，陆汉卿低声朗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革命事业而死，这是陆汉卿，也是郑耀先精神力量的源泉。当陆汉卿被捆绑在木桩上，头顶背后旋转风扇所投射的亮光，恰如一道光环。神圣的信仰，充分激发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在军统的监狱中，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以这种

圣和悲壮，阐释了为何常理中没有人能承受的酷刑，在他们身上却失效了的原因。

当大姐的出现失去了联系人的郑耀先终于可以让组织知道自己是来时，他哭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潜伏的生涯，让他承受了心理上巨大的痛苦与难被理解的折磨。然而哭过之后，他主动选择继续顶着不明不白的身份为党和人民服务，去挖出潜伏在我党内部的国民党间谍“影子”。

郑耀先的大部分人生无时无刻不在生死的危境中，且要面对错综交叉的真情情感。他的三段感情，程真儿、林桃和韩冰，也都混杂着难以割裂的交叉。程真儿两情相悦，但却难以公开；林桃爱得彻底，可却绝非同志；韩冰同病相怜，然而却是他一生之敌。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江万朝、延娥、宫庶、孝安，与鬼子六有杀父之仇却又照顾仇人之女的高君宝，尤其是与“风筝”一样坚定但奉献却不知何为的“影子”等人身上。《风筝》充分展现且张扬了作为情报人员这一特殊职业和群体的复杂交错和难以言说的人性世界。

艺术有遗憾，但为谍战剧寻回了应有质地

这种探索，虽然有效地增强了谍战剧的社会历史厚度，碰触了谍报人员精神世界背后的力量，对谍战剧而言是一种创新的探索，但对于柳云龙来说，这种把握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风筝》播出以来，话题热度不减，但评分却离柳云龙的代表作《暗算》仍有一段距离。这种情况，与其艺术创造力和技术表现力的不足有很大关系。

相比《暗算》，《风筝》的故事构造其实比较冒险。柳云龙的谍战剧，向来并不以场面和行动化的情节取胜，而在于敌我双方智慧的对垒，习惯的是斗智不斗勇，需要依靠情节编织、影像表达和心理能量的不断螺旋积累形成爆点。这种特点，更适合《暗算》这样人物、时空和情节都相对集中的故事，在环环相扣的发展中不断形成高强度的情节和情感的三重聚焦，以叙事黑洞吸纳观众的理智与情感，把他们牢牢绑定在自己叙事的轨道上难以离开。《风筝》的故事，则具有较大历史跨度，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形成空间的几次转移，从重庆到延安再回到山城等地。同时，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处于多方力量拉扯中的郑耀先在不同阶段和时空环境中要面对不同的矛盾，这不得不让剧中的戏剧冲突聚焦不断转换，观众的观剧心理也要不断重新对焦。这种探索，虽然有效地增强了谍战剧的社会历史厚度，碰触了谍报人员精神世界背后的力量，对谍战剧而

言是一种创新的探索，但对于柳云龙来说，这种把握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我们看到，在故事开头到延安这两个段落，虽然构建了一些比较强烈的情节高潮点，但始终难以将观众的心理很好地集中到郑耀先身上。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故事情节开始集中到寻找影子身上，情节焦点和人物关系也回归单一，更具有柳云龙谍战剧的气息，给观众的感觉反而就更有吸引力一些了。同时，这种四段时空故事的结构也造成艺术风格上的割裂。从郑耀先的生死潜伏、到寻找影子的斗智斗勇，到英雄人生最后的落幕，“谍战+反特+情感”的组合，本身似乎可以开拓出历史的宽度和人性的深度，但却中断和撕裂了类型集中的力度。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郑耀先无疑是柳云龙想要突出的孤胆英雄。但这种英雄，需要在旗鼓相当的对手的托举之下才能更加凸显。而在该剧中，与风筝交手的人，哪怕是其最大的对手影子，都无法与之对等。尤其是在剧情的前半部分，基本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对风筝造成实质性威胁的对手，就是影子，也在不断通过语言渲染“鬼子六”的恐怖与可怕。这种描写，脱离了具体情节的包裹，显得难以让人信服。郑耀先虽

然是故事的内核，但在剧中，却迟迟无法成为情感的内核，也影响了观众的心理共鸣。另外，《风筝》塑造的郑耀先是一个极端角色，处于军统、中统等多方力量拉扯之中，风筝和影子双方对垒，各种情感相互交织。这个角色形象，是在以往的谍战剧中所没有的，本应该更加光彩夺目。但遗憾的是，从情节构造来看，因为该剧并没有为这极端的角色创造与之相匹配的极端环境，反而是在历史情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环境和冲突设定，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激活这一形象设定的全部精神能量。与之相对，影子这一角色，也没有真正进入郑耀先的故事链中，没有充分发挥其叙事动力的作用，其形象比较单薄，这就使得剧情后半段两人相似却截然相反的人生结局显得并非那么具有让人深入思考的力量。

在演员对角色人物的刻画上，《风筝》也存在着一一定的遗憾。柳云龙的表演，主要特点体现在特定情节中的细小动作和表情，且有某种模式化的倾向，这也可以说是谍战剧的一种标签。但《风筝》的时空跨度和焦点变化，让柳云龙的这种表演丧失了情节的依托，反倒而显得有些故弄玄虚的做

谍战剧《风筝》刚播出时，观众对它的关注更多来自于柳云龙的回归。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该剧对于谍战剧在思想高度和艺术类型上的表现与探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今天，在该剧收官之际，我们可以说，这一只永不断线的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编者



“我是谁”的问题不仅是郑耀先的终生难题，也是所有情报人员共同的难题。

但如果仅仅如此，该剧则不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论的泥潭。《风筝》分明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葛之上，那不可混杂和抹杀的，依然是无比深沉的信仰！正如该剧主题曲所吟唱的那样，“红色的梦，白色的夜……两个世界不能跨越”。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和体会这种信仰的力量，但《风筝》对信仰的推崇却仍然链接了世俗对英雄的向往，带给这个群体中大多平凡的个人以超越性的情怀。

在该剧的结尾，历经磨难生死垂危的郑耀先来到北京。生命的最后关头，郑耀先想要看一次升旗。当国歌响起，红旗飘扬的时候，躺在救护车病床上的郑耀先孱弱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敬礼。这国旗，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象征，但他却从未奢望国旗为他升起抑或降下。此时，他的眼泪默默奔流。这眼泪，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但绝非仅为自己而流。它证明了郑耀先心中牺牲和价值的崇高感：“一个人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就是对自身价值的最好证明”。这等式诠释了一个共产党情报人员信仰的纯度和奉献的热忱，让人目眩心动。

另外，作为潜伏在我党内部40年的大特务韩冰(也就是影子)的扮演者，罗海琼的表演也受到观众大量的吐嘈。其外形、声音和表演特质均难以承担这一角色的内涵需要，有些轻飘和装腔作势。反而是两个配角宫庶和马小五，以富有特质的表演和情感表达的鲜明度，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此外，《风筝》的影像语言依然具有柳云龙谍战剧的特点，缓慢、沉静、执着，特写镜头与略微仰拍的镜头偏多，这些也因为故事情节密度和情感强度的减弱而变得无法与叙事相融无间，特色反而成为一种拖累。蒙太奇的使用上，频繁且无必要的镜头叠化闪回一方面让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力显得较为陈旧和不自信，同时也打断了叙事的节奏，拖慢了情节的进展，影响了悬念感的维持。

尽管《风筝》存在着以上种种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近几年来比较出色的谍战剧作品。该剧对人性之上还有信仰的表达、对情报人员特殊人生和世界观的呈现、对谍战剧一贯的考究，以及制作的精良，都使得越来越走向偶像化的谍战剧寻回了一些它应有的质地。而柳云龙通过该剧，也试图为类型化的谍战剧拓展出一些新发展方向，虽然这种探索留有诸多遗憾，但其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

于此，我们可以说，对于“风筝”以及今后的谍战剧，信仰的线不会断，艺术创造的线不能断。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这些短篇小说，让人看到何为成熟写作

黄德海

或许一开始就有必要说明，题目中的“成熟”，并不指向技艺，强调的是一种心智状态，一个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停留在青春期的躁狂，非线性地认识人心和人生，不轻易抱怨自己面对的现实，而是承认乃至接受自己所处的情境，因此有效地深入了这个社会的复杂肌理。如果不是怕自己挂一漏万的人，我很想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读到的成熟小说并不多(满怀怨怼和缺乏反省常常导致小说的幼稚化)，却正因为难能，才显出了可贵。

成熟的心智，起码要有勇气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张楚的《人人》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便隐含着他对人世的认识。那些小说里伸展出去的枝杈，没有来由的转折，极其微细的心思，不用明言的温照，不可告人的歹心，都在叙述中慢慢伸展开来，氤氲出真实的人世气息。这人世你难道可可爱爱，是希望疏远还是倾向亲近，每每在你热热心热肠时，它一把把你推开；你堪堪心灰意冷了，它又兴冲冲地走向你。张楚写的，似乎永远是纠缠在非之间的宽阔地带，它让人意识到，写作者和阅读者与小说人物置身其中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刻，“我们”跟“他们”休戚相关。这一相关性消除了写作者和其虚构世界里的人们的敌意，在宽阔的人世和当下的时刻缔结和解的盟约，共同走进了绵长的生活之流。

那些对生活深思有得的人，会明白这个绵长的生活之流，即便在如今的急促的节奏里，也仍然不疾不徐地生长着。舒飞廉的《田鼠之家》让人不断想到自然和生活的内在节奏，举凡村庄的节气时令，草木虫鱼，手工艺作，玩物吃食，家长里短，他都能品咂出一番味道。人，便是在这时序变化里存身，村庄里的种种，也就与荒蛮中的飞潜动植不同，有着人的温照，算得上草木有思，因人赋形。小说中的人，也因为早知万物有其情实，便不是匆匆在情节里起伏，而是在万事万物里行住坐卧，一行一动带着摇曳犬吠，水起涟漪。舒飞廉就这样不急不缓地一路写来，故事和情感，都不是直线，曲曲折折，蔓延延延，牵丝攀藤，现实里生出的现实，记忆里长出新的记忆，没有斩截的中断，就像阳光下的人世。没错，小人物改变不了世界的运行轨迹，也不知道世界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无限制的向往和激烈的反对，都会让文字跟着这世界飞驰，紊乱内在的节奏。好在有舒飞廉这样的文字，提示我们留意那些比变幻莫测更为安稳的什么东西。

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当然知道明暗交织才是人世的常态，不会幼稚地认为人间没有凶事，或者只是揪住凶事深挖人性的黑暗。艾玛的《白耳夜警》仿佛夜晚独行时望见万千人家窗口，内里的喜怒哀乐，忧乐无端，甚或凶凶恶恶，都被透窗而出的灯光，摄取为一派宁静；又如白艾渔樵笑谈古今，多少尘世的剑拔弩张，已在一壶浊酒里旗鼓偃息。那人间凶事的惊涛骇浪，经过剧烈的动荡，在艾玛笔下重又来自另一种平静摄取，秘密隐藏着凶狠没有株连而来，另人跟凶和解，跟道原谅言和，因而所有的激情和欢愉，不幸和凄苦，连带不可原宥的深重罪过，就都有了内在的温情。是的，你给了别人灾难，毁了自己的生活，无法请求原谅，可是，你仍然可以让所有的凶事及身而至，把温暖的底色留在世上和纸上——杏与橄榄皆熟透/岁月的善举”。

人生活的世间，不会事事如意，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不顺心，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如何跟这些不顺心相处，牵扯到是不是成熟到足够面对复杂。董夏青青的《特恰里特山下》，主人公身在军队，又多了一重长期分居造成的家庭关系危机。可无论在怎样的艰难之中，“我”或不少“我们”仍然没有下决心脱下军装。写人对理想的坚持和对现实的认知时，董夏青青的笔始终安静克制，既不夸张，也不按压，就仿佛那件大事情潜进了日常的每一个角落，笔墨里有着郑重的气息。读完这篇小说，你大概会相信，人间还有那么一点点值得赞许之处，把这个值得赞许体现出来的，不是笨或鲁莽的好心，而是老于世故且非常专业的人，我们也就由此看到了“善念进入到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有无奈，更有值得信任的坚韧。

最后，我想提到王威的小说集《去海拉尔》——因为满足了我长久以来对所谓成熟心智的部分期待，我很想说，这是一部几乎可以作为某种标尺的作品。小说里的一桩桩琐事，都隐隐传出时代潮汐的风雷之音，正因为这声音太过沉静，要非常仔细才能分辨出来。或者可以这么说，王威小说里的时代潮汐，就直接表现在人物身上，除了人和人经历的事，并没有另外一个被称为时代的东西。或者更进一步，不只是时代之风会塑造人的样貌，人与人之间，也会因为不同的性情和认知，交叉影响，在塑造出自己特征的同时，也定义出对方的某些形态。作为性情、认知及其他特征的集合体的人，总会在某个时刻走进人群，于是不免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与人交往，也难免会碰撞、擦伤、内心受伤，最后差不多总是结束于怨怼——抱怨世界，抱怨生活，抱怨人。

用怨怼填满人生，人就长成了怨怼的样子，有志不获骋，难免自伤自生。怨怼是一种苍老的天真，“一种长不大的幼态持续，一种永恒的年轻，也带着年轻特有的唯我、狂暴、嗜血和抒情，如昆德拉讲的这样，还不知道怎样恰当地进入到世界”。王威与之相反，是一个镇静地行走在世界里面，并反思过这世界状况的人，那种在人群中遇到的碰撞、擦伤和内心伤害，因为其人的存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由此改变一点自己固有的样子，生成更为精致微妙形态，甚至心底也变得清澈起来——对，是清澈——只有心智成熟带来的清澈，才会半途而废，并经过住时间的长期淘洗。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